

重视全球化出现的新变化

马志刚

来看,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绝对比例也都是新兴经济体贡献的,其增长潜力以及对全球技术、资金、产品的巨大需求,为全球化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为世界各国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

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实体经济领域竞争空前加剧。与前几年侧重虚拟经济不同,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重返实体经济领域,提出了世界经济“再平衡”以及贸易逆差美国扩大出口等政策设想及目标,导致制造业竞争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源、市场和资金竞争更加激烈。最近,英国政府就高调举行全球投资大会,以期吸引更多外国投资,为英国实体经济复苏和增长助阵。美国、欧盟等加快“再制造化”,发力新兴产业,其目的说白了也是为了在未来的实体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更让人关注的是,为了达到

这一目的,部分发达国家还对主要出口国举起贸易保护大棒。2012年,仅我国出口产品遭到贸易救济调查的涉案金额就近280亿美元,同比增长300%以上。

还有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国际贸易规则博弈激烈,全球贸易自由化出现新趋势。启动于2001年的多哈回合谈判10余年进展甚微,多边贸易自由化陷入低潮,而区域集团化趋势却风生水起。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正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为两大支柱,构筑游离于原有贸易规则、具有强烈排他性的新格局。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加入相关谈判。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受到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影响,我国也不能例外。面对全球化

的新变化,我国亟须寻找新的定位。过去30多年,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贡献巨大,“世界工厂”的角色可以让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好,但如今这一切赖以存在的大环境正在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体现在贸易的传统市场在萎缩、新兴市场在兴起,中国面临新的机遇;更表现在国际贸易竞争白热化和国际经贸规则纷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挑战。在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只能走转型升级的路子,外贸发展方式要转型升级,产品制造要转型升级,整个经济都要转型升级。只有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了,内功夯实了,中国应对全球化新变化的筹码才会更大,才能真正把握话语权、有效化解挑战。时不我待,在这方面,动手越早越主动,动手越晚代价越大。

热点透析

新型城镇化道路如何走

唐亚林

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基本问题。从现代化发展规律看,今后一二十年我国城镇化率将不断提高,每年将有上千万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市。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新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走好新型城镇化道路,如何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是值得深思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城市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小城镇建设稳步推进,城镇空间结构不断优化,已初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城镇体系,广大群众也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普遍得到了实惠。2011年底,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城镇化率突破50%;2012年底,城镇化进一步推进,城镇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为52.6%,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然而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深刻地认识到,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还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城市地理区域空间“摊大饼”式扩大;城市建设局限于土地开发与房地产建设;城镇和乡村公共服务初始水平低下等。

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率还存在“虚高”成分,实际享受城镇化制度安排的人口要远远低于现有的城镇化率。这是因为在现有体制下,我国26261万农民工中,有16336万人在城镇打工,由于户籍限制,他们无法真正享受城镇化成果,但又被统计为城镇人口。而且,进城务工人员还出现了新的动向。数据显示,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28岁,“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近一半,其中占据主体的新生代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大多数在城市成长,基本不懂农业生产,即使经济形势波动,城市就业形势不好,他们也不大可能返乡务农。此外,超过30%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生活时间超过5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家庭规模达到2.5人,青少年流动人口和老年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72%的流动人口子女家庭通过租房居住,尤以租住私房为多。住房条件和子女教育正在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在城镇稳定生活的重要因素。

这些问题的出现意味着以往有规模、无质量、简单粗放的城镇化发展既不科学又不可持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从历史发展维度把握农村社会日益呈现出的代际更替规律和村庄空心化的现实,从战略高度认识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意义重大。

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不仅事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根本历史任务的尽快实现,是近阶段和未来一段时间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而且事关广大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有效提升。具体而言,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城镇化发展必须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有机匹配。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更没有高质量的城镇化。城镇化发展不能简单地以城镇化的外在空间形态的成长为取向,而应以日益成长的工业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为基础,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最终实现让居住在城镇以及生活在周边的居民共享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化同步发展的成果。

第二,城镇化发展必须与主体功能区战略定位有机匹配。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遵循主体功能区的战略定位并与其有机匹配,做好在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的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工作,防止在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大肆开发新城,造成资源和要素在空间布局上的浪费,更要防止造成对资源、环境和生态的新一轮破坏和污染活动,从而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发展和 社会发展协调发展的目标。

第三,城镇化发展必须与区域发展程度有机匹配。我国是个大国,各地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历史基础不一,经济发展程度快慢各异,并不存在同一种城镇化发展模式,尤其是各地城镇兴起的动力机制不一致,自然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模式也就可以多种多样,切忌不顾各地实际的超前发展和胡乱发展,更需要将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居民的有序转移、农民市民化进程和农村社会长远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此外,城镇化发展还应与农村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相匹配,为他们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发展环境和心有所安的精神家园。从某种意义上说,提升城镇化质量建设水平,其发展之道不仅在于将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有机结合,不仅在于推动城镇地理空间的扩大、人口的聚集,而更在于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就业方式的拓展、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宜居环境的塑造、公共交往的丰富以及精神生活的充实,其根本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公共服务、人居环境等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因此,我们必须逐步改变传统的增长导向型城镇化模式,以民生改善为根本目的,不单纯追求城镇化的速度,更关注城镇化进程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搭建让广大农村居民“出得来”、“回得去”、“留得住”、“有尊严”的新型发展平台,从而将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居民生活意义世界的构建有机地统一起来。比如,需要全面推进以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综合配套改革进程,彻底破除依附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各种约束性制度体系的束缚;再如,防止新一轮城镇化发展陷入片面追求城镇化率、“大拆大建”式土地开发的窠臼。此外,还应着力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大力提高城乡统筹和建设水平,逐步使城乡居民基本无差别地同享现代文明、均享基本公共服务。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本版编辑 裴珍珍
邮箱:peizz@ced.com.cn

救灾重建彰显制度优势

广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从汶川到雅安,短短5年间,突发的地震灾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的成长,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团结,看到了灾难中坚挺的中国脊梁,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

的主人翁意识,大力发扬全国一盘棋精神,一切为了灾区、全力支援灾区,主动投身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中。在汶川灾后恢复重建中,上万亿元重建资金顺利筹措,几十万建设大军迅速组织,四万多个重建项目快速推进;在芦山抗震救灾中,短短几天内,400多支专业救援队伍、上万医务工作者、数十万志愿者奔赴灾区,数百万吨食品、药品、帐篷、机械等救灾物资通过空中、铁路、公路、水路驰援灾区。抗震救灾的事实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巨大灾难和突发事件时能够举全国之力办大事,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

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的理念,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根本出发点,坚持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突出点。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理念,树立“救灾就是救民、重建就是为民”的思想。在汶川灾后重建中,优先推进住房重建,震后一年内,365万户震损住房修复加固全面完成;震后一年半,150万户农房重建全部完成;震后两年,26万户城镇住房重建基本完成。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规划重建3002所学校、1362个医疗卫生机构已交付使用,标准更高、功能配套更全、服务能力更强,并成为最安全、最牢固、群众最放心的避险场所。着力解决灾区群众的特殊困难,157.5万因灾失业失地人员实现就业,妥善解决了20万耕地损毁农民的安置和生计问题。重建后的灾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群众说,现在灾

区“最漂亮的是民居,最安全的是学校,最现代的是医院,最满意的是百姓”。在芦山抗震救灾中,地震刚一发生,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抢救生命作为首要任务;李克强总理当日下午就抵达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发出“一刻不能停”的救援指令。从中央到地方,所有抗震救灾机制迅速启动:震后53秒,第一条震情微博发出;3小时内,第一支救援部队火速到达震中;一天后,首趟铁路抢险救援专列已到达灾区;两天后,国家应急广播首个定向应急频率芦山开播……现在,抗震救灾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灾区生产生活正在恢复正常,人心安定、社会稳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组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汶川灾后重建,坚持把恢复重建与跨越发展相结合,注重增强“造血”能力,使当地生活生产迈上新台阶。在重建过程中,把基础设施重建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程,建设了一批关系长远的基础设施重大项目,整个灾区基础条件得到极大改善;重建城镇注重城镇道路、供水、配气等市政设施建设,建成了一批布局科学、功能配套、具有现代风貌的新城镇;生态环境加快修复,林草植被基本恢复。同时,把产业重建作为实现灾区发展振兴的基石和支撑,积极培育壮大优势产业,抓住时机淘汰落后产能,着力增强灾区自我发展能力,一批重点企业借势推动技术升级、电子信息、汽车制造、油气化工等产业迅速崛起,引进了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和优势企业,促进了产业集中集约发展。目前,汶川地震灾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 and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得到全面恢复并超过灾前

水平,实现了“家家有房住、户户有就业、人人有保障、设施有提高、经济有发展、生态有改善”的重建目标,不仅基础设施、人居条件、社会形态实现了巨大进步,而且在经济结构、产业布局等方面进行了优化升级。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灾难面前,中华民族迸发出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使整个世界都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力量,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优越性。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吃苦耐劳不畏牺牲的优良品格。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使这种精神特质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并在这场抗震救灾的伟大斗争中集中地表现出来。抗灾抢险中,英勇的中国人民毫无畏惧,党员干部身先士卒,人民军队冲锋陷阵,白衣战士舍生忘死,灾区群众奋起自救。灾后重建中,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迎难而上,全国上下大力弘扬抗灾救灾精神,集全国之力支援灾区恢复重建,灾区广大人民群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重建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的新成果。

汶川恢复重建和芦山抗震救灾的伟大实践充分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团结各方渡难关;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战斗力,能够应对各种风险考验、驾驭各种复杂局面。只要我们坚持发挥政治和制度优势,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执笔:温宪元 张道群)

重在提升城市群的质量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冯 奎

目前,一些省、市纷纷以省会、地市中心、提出要构建各种不同的城市群。应该指出,城市群也存在着发展质量的问题,简单依靠在规划图上画圈圈,以及不恰当地通过行政力量捏合的许多所谓的城市群,存在许多问题,将会演变成未来的“城市群病”,主要表现在:一是有的地方的城市群规划不切实际地夸大资源的向心集聚,规划的科学性较差。二是城市群内部缺乏沟通协调机制。三是存在着重经济、轻生态的问题。四是城市群人口承接的功能没有完全发挥。

提升城市群质量应把握以下重点:第一,促进各类型城镇有机分布,推动人口城镇化。在一个高质量的城市群内,大城市要素市场发育完备,具有较强的规模效益,是各类企业总部区位选择的理想场所,有利于集聚高端服务业人才。城市群内的各类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生产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功能独特而互补,方便企业进行区域布局,同时能够吸引大量生产性服务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生活。大城市、中小

城市与小城镇通过便捷的交通线路予以连接,能够充分发挥不同城市的优势,成为具有活力的新型城市化地区,这为人口在城市群中的相对均衡化分布创造条件。通过在城市群内分流人口,推进人口相对均衡分布,既能避免大城市过度膨胀,又能避免中小城市、小城镇规模过小,达不到经济发展的“人口门槛标准”。

第二,发挥城市群经济效应,提升全球竞争力。城市群的发展不是一味拼凑城市数目,盲目追求面积与人口规模扩张,而是要千方百计增强城市群的各种积极效应。只有这样,它们才能成为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增长点,成为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的有机结合,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新型地域单元。否则,城市群就仍然停留在粗放式增长的状态。一是要提升竞争效应,竞争效应导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二是要提升学习效应。城市群内的城市联系紧密,城市创新的各种做法能够很快被其他城市学习掌握,能够转化为城市自身的能力。三是要提升成本节约效应。城市群内部城市

共同举办一系列活动,由于存在着既定的各种沟通渠道,协调成本相对较低。四是要提升规模效应。有些重大项目需要足够大的消费群体或配套能力,才有投资价值。例如一些大型的生产资料市场布局就要求区域范围内要有足够多的上下游企业。五是要提升品牌效应。城市群形成后,城市群的城市既获得城市群的集体品牌,也有自己独特的城市品牌,这对于国际合作是很重要的无形资产资源。

第三,加强城市间合作,治理面域性生态环境问题。所谓面域性生态环境问题,是指这类生态环境问题产生于一个或多个城镇,并且影响到一个或多个城镇。大江大河大湖的污染问题、城市群的空气污染问题等等,都构成了面域性生态环境问题。面域性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在城镇群范围内进行治理,才能收到根本性的效果。从技术上来说,面域性问题涉及的环节较多,只有多个城镇协同解决,才能将问题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直接后果、间接后果查找清楚,对症下药。